

苏

轼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苏
轼

● 李真瑜 田南池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8 · 大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郭预衡,侯光复主编, -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4

(月亮文库/康琳,侯光复主编)

ISBN 7-80612-467-5

I. 中… II. ①郭… ②侯…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205 号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全 11 册)

郭预衡 侯光复 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字数:27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3 插页 55

印数:0 001~8 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文彦 责任校对:刘青 宋丽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意设计中心 陈正平 程萍

ISBN7-80612-467-5/I·70

登记号:(辽)第 15 号

定价:198.00 元(全 11 册)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主 编 郭预衡 侯光复
常务副主编 康 琳
责任编辑 许文彦
装帧设计 羽 人
插图绘画 王国能

《庄 周》卷	张文澍	选注
《司马迁》卷	黄 涛	选注
《韩 愈》卷	洪祖斌	选注
《柳宗元》卷	尹 江	选注
《欧阳修》卷	阿忠荣	选注
《曾 巩》卷	张廷银	选注
《王安石》卷	萧 放	选注
《苏 轼》卷	陶文鹏	选注
《晁有光》卷	齐石宜	选注
《袁宏道》卷	李真瑜	选注
《集外卷》卷	田南池	选注
	赵伯陶	选注
	李 鸣	选注
	韦凤娟	选注

前 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散文创作而闻名的大家不少。其中可称祖师者，有先秦的庄周、汉代的司马迁；可称大家者，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轼。唐宋以后，可同大家比肩者，有明代的归有光；可与大家抗衡者，有晚明的袁宏道。其作品或汪洋恣肆，或生动传神，或逻辑严密，或文采横溢，均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这十位大家散文创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11卷11册，选编了这十位散文家的全部经典之作。其中，《集外卷》还汇集了自先秦至清末除此之外其他作家的散文精品。若以单卷论，本书收入了中国古典散文十大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古典散文创作的全部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各个时期散文艺术最高成就的佳作名篇。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创新。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散文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篇文章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写作背景和作品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该散文家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创作简表”和“散文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路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该散文家的其他选本或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散文作品大多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除庄周、司马迁和王安石以外,每个散文家的作品都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篇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作家们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去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苏轼的生平与散文创作

苏轼(公元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洵长子,苏辙长兄。父子三人,号称“三苏”,并为唐宋八大家之列。出身寒门地主,幼承家学,精通经史。至和元年(1054),娶王弗为妻。两年后,兄弟二人跟随父亲进京赶考。嘉祐二年(1057)与弟同榜考中进士。深受主考官欧阳修与参评官梅尧臣两位文章大家的赏识,欧阳修对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并感叹道:“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并亲自介绍苏轼拜会宰相文彦博、富弼和枢密使韩琦,苏轼因此而名声大震。后因奔母丧回蜀。两年后举家迁往京城,并于嘉祐六年(1061)应中制科

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此期间，苏轼写了二十五篇《进策》，要求改革冗兵、冗官、冗费弊端。仁宗年间，虽是所谓“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实际是危机四伏之秋。年轻的苏轼能够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朝政的革新主张。

至平二年（1065）凤翔任满后，苏轼回京任职史馆。妻子与父亲先后病故京师，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还朝任职，这时王安石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变法，朝中许多元老因反对变法而纷纷去职。苏轼也连章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未被采纳而自请外调。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以后又先后担任密州、徐州和湖州太守。在徐州任上，恰遇黄河决口，苏轼亲率军民护堤守城，保全了全城居民的安全。在此期间，苏轼不满变法，对其中的弊端“不敢漠视”，经常“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以后，御史李定和舒亶、何正臣等人从苏轼的诗文中深文周纳，弹劾苏轼以诗讪谤，元丰二年（1079），将其从湖州任上逮捕入狱，即有名的“乌台诗案”。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直到元丰七年（1084）才改贬汝州，离开黄州。第二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政，启用旧党司马光，苏轼也被调回朝中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是他不同意司马光不加区别地对新法一概废除的做法，认为应该“参用所长”，所以

为旧党所不容。对“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的现象极为不满，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在杭州开湖筑堤，颇有政绩，“苏堤”至今犹存。两年后召回京城，但他“七上封章乞除一郡”（《气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太守。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重新得势，苏轼动辄得咎，横遭贬谪，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县）。过着“食无肉，病无医，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艰苦生活（《与程天侔》），直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才渡海北归，第二年死于常州，享年66岁。南宋孝宗隆兴年间追谥文忠。著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仇池笔记》、《东坡志林》等著作，后人辑其诗文奏牍等为《东坡七集》一百一十二卷。《宋史》卷338有传。

苏轼世界观是丰富而又复杂的，儒、释、道三家并存，但其基本思想无疑是儒家的，对三家均有去取，各有所用。年轻时以儒家为主，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的理想盛世（《策别》第八），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表明了他辅君报国，治世安民的儒家理想。在遭受了政治上一连串的打击和迫害之后，释、道思想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起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使他身处逆境而坚持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在超然荣辱得失的旷达下，仍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

的不懈追求。当然，齐生死、等是非等虚无主义也对苏轼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苏轼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与生活态度，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苏轼仕途极为坎坷，由于他主张改革却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因而既与新党发生矛盾，又与旧党产生磨擦，再加上他为人坚持操守，表里澄澈如一，不肯“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得他既不见容于新党得势的元丰年间，又不得志于旧党执政的元祐时期，更受挫于新党复辟的绍圣时代，一生历尽磨难，而这又恰好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与与人民的接触，扩大视野，为他在文学各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是北宋最著名的大文豪，在各个创作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文学创作理论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极为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写文章“酌古以御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答俞括书》）；“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送人序》）；要敢于独创，不走前人的老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他特别强调“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答王庠书》）；在实际创作过程中，注意积累与灵感的结合，提出“胸有成竹”的著名论断；在文风上又说“凡人文字，务使平和”（《与黄庭坚》），不赞成为文造情，无病呻

吟。苏轼的文学创作是他艺术观的成功体现，所以无论是散文辞赋，还是诗词，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苏轼存诗二千七百多首，内容广泛，风格多样，包罗万象，人罕能及。其诗与黄庭坚齐名，人称“苏黄”。他一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足迹几遍全国。他曾长期显达，担任名藩重镇的长官和皇帝的顾问秘书，又曾长期沉沦，流放僻远蛮荒之地，这样的生活经历，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和多样的观察角度，壮丽的山川风物，各异的风俗民情，宦海沉浮的喜怒哀乐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态炎凉，都发而为诗，自然是千姿百态，横无际涯，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当属他的写景诗与理趣诗。前者如《游金山寺》、《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无论是壮观的长江夜色，还是秀丽的江南水乡，无不写得姿态万千，妙趣横生。后者如《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晓景》、《琴诗》，都能在日常生活的自然景物中悟出哲理，发人所未发，意在言外，寓理于景，可说是苏诗的独创。总之，苏诗才情横溢，想象丰富，比喻繁多，触手成春，成为宋代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苏轼写了三百六十首词，在他卷帙宏富的文学创作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还不及他诗歌总数的八分之一。然而，就一种文体的开拓和创新来说，苏轼在中国词史上的贡献并不亚于他在诗史和散文史上的贡献。他

的词不受音律束缚，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另辟蹊径，创作了一批风格一新的词章，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的功能，具有浓厚的浪漫情调，形成了清新豪放的风格，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写报国壮志，如“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写农村生活，如“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写贬居情怀，如“夜饮东坡醉复醒”（《临江仙·夜归临皋》）等，总之举凡耳目所见，心动情感，一一罗致笔下，言志叙事，咏物说理，莫不随心所欲，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刘熙载《艺概》）。苏轼这种“以诗为词”（陈师道《后山诗话》）的大家手笔，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领域，或天地奇观，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或缠绵悱恻，如“似花还似非花”（《水龙吟》）。苏轼以自己三十多年的大胆实践，于剪红刻翠之外，指出向上一路，为宋词开辟了一片广阔而高远的创作天地。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大家，他诗有专长，词有独创，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但其一生用力最勤，还属散文，他曾多次谈到“文章如金玉”（《答毛滂书》），“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他因诗文写得好而名满天下，也因而穷困潦倒，“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答刘

沔都曹书》),“那怕在海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书海南风土》)的艰苦岁月中,每读到一篇好文章,“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答刘沔都曹书》),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他正是以坚实的功底和豪放的才情,沿着欧阳修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在欧阳修死后,成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领导和文坛领袖,其作品代表了“新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他的议论文雄辩滔滔,气势磅礴;他的记叙文挥洒如意,摇曳生姿;为散文创作开创了崭新的天地。

苏轼在散文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首先得益于他对前人的批判与继承,他对于唐末五代乃至宋初散文创作的成就与弊端看得一清二楚。他指出宋初诸人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时,由于“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致造成“余风未殄,新弊复作”的局面(《上欧阳内翰书》)。所以,振兴古文,就要同时向浮艳与艰涩两种倾向进行斗争,而苏轼的散文追求的正是在“浮巧轻媚”与“求深务奇”之外的全新文风。当然这种对当时以至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文风并非苏轼所独创,其首倡者是欧阳修,苏轼是在欧阳修的倡导和感召下,方向更为明确,创作也更加成功了。苏轼就是发扬了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吸取前人特别

是韩愈和欧阳修的宝贵经验，而成为古文运动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

另外，苏轼的散文理论也比时人有着更高的眼光与气魄，他说：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答俞括书》）

苏轼的这些言论，涉及了文学创作的三个主要过程。首先，是要“求物之妙”，这是一个对“物固有是理”的认识阶段，要对创作对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要能够发现常人所未窥见的妙处；其次，是对创作对象“了然于心”，即他在《筧篨谷偃竹记》中所说的“得成竹于胸中”的阶段。这个所谓的“成竹”当然不是指天然竹子的简单表象，而是一种主客观统一的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已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艺术半成品；最后，是“了然于口与

手”、“达之于口与手”的实际创作阶段，即用语言或文字将头脑中已经初步形成的构思表达出来完成实际的作品。只有这三个阶段都能准确完美地实施，才是苏轼认为的“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答王庠书》）的至高境界。苏轼对孔子“辞达”的见解是他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过多方面的论述。第一，“了然于心”者，不一定就能“了然于口与手”，也就是说有德者不一定有言，艺术创作有着自身的规律，必须下功夫勤学苦练，“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筥篋谷偃竹记》）；第二，“了然”的标准是“随物赋形”（《自评文》）。客观物象能明确地呈现于艺术构思中，才算“了然于心”；而只有把它准确形象生动地在文章中表达出来，才算“了然与口与手”。只有到了这一步才是苏轼认可的“辞达”，所以他才一再强调“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苏轼的散文创作正是他上述理论的具体典范，他对自己的散文也是相当自负的。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

苏轼散文的数量大，题材多，其主要作品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政论和史论，一类是书信、记、序等杂文。

苏轼是洞悉历史而又有丰富社会和政治活动经历的人，所以他的政论和史论便不同于一般的书生之见。其中虽有不少“制科”文字，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如著名的《教战守策》，这是苏轼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应制科考试时写的二十五篇《策论》中的一篇，文章虽写于当时的所谓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事”，但已是危机四伏，苏轼能够见微知著，居安民危，“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苏轼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虽善于养身而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虽“终风劳苦而未尝告病”。而朝廷陶醉于表面上的太平景象，却对潜伏的战争危机视而不见，“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敌情如此而“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全文切中时弊，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史论《留侯论》一扫黄石公授书的神密传奇色彩，论证秦末隐士有意启迪年轻气盛的张良韬晦待时，以成大业。充分显示了苏轼史论纵横捭阖，雄辩滔滔的风格，确有《孟子》、《战国策》之风。

苏轼散文的最高成就在于他的书信、记、序等杂文。在这些杂文中，有苏轼所谓

“词语甚朴，无所藻饰”（《上梅龙图》）的作品，有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作品，也有所谓“闲暇自得，清美可口”（《答毛滂书》）的作品。

苏轼广于交游，笃于友情，在书信中苏轼往往将自己的内心合盘托出，使人能够洞悉他那光明磊落的胸怀与坚贞不二的操守。如《与杨元素书》中写道，“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在《与千之侄》中说“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有些书信，所言虽然只是日常小事，但苏轼大都随笔挥洒，充分显示了他坦率开朗，随遇而安的个性。如写于黄州的《答言上人》谈到，“遭居穷陋，往还断尽”，“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指杭州）旧游，未见议优劣民。”而写于海南的《与程天侔》中谈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身处逆境，而字里行间全无一丝衰飒之气，却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向上的精神。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从作家的日记和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